

当代资本主义的人口再生产危机：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李怡乐*

【摘要】本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危机现象,包括低生育率、居民健康风险上升、照料意愿下降,以及围绕人口再生产的社会运动增多等问题,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再生产危机的成因。本文梳理了马克思、波兰尼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关系的理论,探讨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演化,人口再生产逐步实际隶属于经济生产的过程。其间,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工具性需求,与再生产活动的情感、非效率特征持续冲突,削弱了全社会的照料能力,并引发再生产领域的激进抗争;政府的协调性制度本就难以解决生产与再生产性质差异的矛盾,随着经济增长乏力与不稳定就业增加,协调性制度进一步趋向失灵。结合技术变革趋势与人口再生产面临的困境,走出危机需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使技术发展服务于人,重建集体性的人口再生产支持系统。

【关键词】人口再生产危机;马克思;波兰尼;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照料

近年来,全球人口再生产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危机现象引起广泛关注。首先,人口出生率呈长期下降趋势。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报告 2024》,2024 年全球 237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为 2.3,但一半以上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 李怡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E-mail:liyile@swufe.edu.cn。

引文格式:李怡乐. 2026. 当代资本主义的人口再生产危机: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 政治经济学季刊, 5(2):73-106.

Cite this article: Li Y L. 2026.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2): 73-106. (in Chinese)

已经低于 2.1,即低于保持人口规模稳定更替的标准水平^①。另据测算,低生育率趋势将持续蔓延,到 2050 年,全球 76% 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GBD 2021 Fertility and Forecasting Collaborators,2024)。第二,劳动者身心健康面临的风险加剧。除新冠病毒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外,与高热量、成瘾性饮食摄入增长相关的身体健康风险增加,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②,在数字技术强化了社会时钟对个体行为模式管理的同时,技术体系与有机生命体代谢需求的冲突也在加剧。第三,人口再生产中的照料不足趋向加深。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标准化健康管理与科学育儿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和家庭需要持续将更多资源用于人口照料;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体系对高质量集体消费资料的供给乏力,优质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愈加取决于个体支付能力,而劳动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数字时代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又持续挤压家庭用于人口照料的时间,削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和维系社会共同体的能力,南希·弗雷泽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称之为“照料危机”(crisis of care),或冠以更宽泛的“社会再生产危机”^③之名(Fraser,2016;弗雷泽,[2022]2023)。第四,人口再生产领域的社会斗争加剧,并表现出纷杂的形式,既包含居民对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劳动力再生产资料分布不均衡的抗议,也有以性别、代际冲突等形式呈现的围绕人口再生产责任分担问题的争议。随着产业变革与灵活就业增加,在传统大工业中的劳资斗争模式被相对削弱的同时,人口再生产领域多种形式的斗争显得更为突出与激烈。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生产相对过剩、失业增加、利润率下降、劳资矛盾加剧等为典型特征,那么与之对照,人口再生产危机则表现为出生人数绝对减少、照料紧缩、居民健康水平下降、社会成员身份矛盾激化等问题。关于人口危机的既有研究侧重于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及其与经济和自然环境不适配的问题(萨卡,2014;穆光宗,2019),本文从“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切入,首次尝试将当代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多种矛盾现象,纳入“人口再生产危机”这一分析概念中,在理论梳理和现实分析中贯穿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二元互动,为人口再生产矛盾的形成与演变趋势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解释。

下文将首先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人口再生产理论,基于人口在剩余价

①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https://population.un.org/wpp/>。

②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精神卫生报告》,2022 年 6 月 16 日,<https://www.who.int/zh/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50860>。

③ 弗雷泽等学者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危机指的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照顾朋友和家庭成员、维持家庭 and 更广泛的社区联系的社会能力的下降,其典型表现为照料危机。

值生产与实现中的功能属性,梳理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生产隶属性增强的理论与历史过程。相较于马克思“以生产为中心”的视角,即劳动力再生产的制度安排受制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演变,波兰尼强调维护“再生产条件”是市场得以运转的必备条件,认为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将在稳固市场经济运行与维护生命的神圣性之间实现有效调和,使得现代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可以看到,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保证合乎数量与质量的劳动力供给。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制度设计经历了升级和转型,无论是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的福利国家制度,还是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商品化、推动劳动力再生产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人口再生产的建构持续强化。生命政治网络的搭建,以新的证据呈现了马克思笔下剩余价值生产对自然的人的重新塑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21世纪以来人口再生产的协调性制度为何趋向失灵?维护劳动力自由和安全,与维持市场经济增长和秩序,这两重目标还能否再被调和?与马克思和波兰尼的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注家庭、性别分工在人口再生产实际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再生产具有高度情感依赖性、异质性、非效率性、非竞争性等特征,这使其运行逻辑与市场经济中以交换价值为中心的生产体系运行逻辑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对家庭模式和性别分工、对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塑造,不断冲击和压缩人口再生产的自然基础,可能正是导致人口再生产困境的主要原因。

综合以上理论视角,本文对人口再生产危机的分析,突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如何削弱家庭和公共部门支撑人口再生产的能力;劳动者在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中的工具性角色以及在生产领域的议价能力下降,加速了其在再生产领域的激进反抗。探寻人口再生产危机的出口,一方面,人口再生产困境本身与资本主义无限的增殖逻辑渗透到人的生活中相关,难以用增长和再分配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人的日常生活已被商品市场和工业生产深度加工,人口再生产领域多种形式的矛盾抗争,如果脱离了对生产方式的反思与革命,也将持续陷入分化与混乱,与人口再生产原本需要的集体支持背道而驰。当前人工智能、平台制生产组织形式等重大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既有可能推动技术封建主义、进一步加深人口发展鸿沟,也内含了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生产趋于衰退、生产与再生产分割逐步走向终结的潜能。关键在于以何种生产关系适应新技术体系,重建对人口发展的有效支撑。

一、马克思的人口再生产理论——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生产的实际隶属过程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定的人口再生产是特定物质生产、经济关

系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生产的条件和形式决定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与形式这一具有历史一般性的观点：“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 520）

在此一般性框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有关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人口再生产的理论，主要出现在两个体系中。其中之一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就原始社会人口本身作为一般的生产力、家庭作为唯一的社会关系这一状况，指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即“两种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p. 16）“两种生产”将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相并列，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在此的研究是以对原始社会的人类学考证为经验材料的，这一历史时期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合二为一，伴随私有制的胜利，经济关系与家庭关系分离，当家庭不再是主要的物质生产单位，人口生产也与物质生产相区分。人的角色、功能由从属于家庭—自然关系，转向主要由经济—社会关系再生产（王峰明，2021）。

其二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范畴的《资本论》体系，人口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原材料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人口再生产就是隶属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关系再生产的劳动力再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p. 24）。而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他这样表述，“自然产生的高度的劳动生产力是和人口即劳动能力的迅速增加，从而是和作为剩余价值来源的那种材料的迅速增加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p. 370）^①。因此，在对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中，马克思笔下“人口”的概念等同于“劳动力”“劳动能力”。由于“人口”的首要功能即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的运行总是以适宜的人口数量和质量为条件，这也使得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人口再生产不断受到经济生产内在需求的塑造，总体上使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生产的隶属性增强，并逐渐加剧“两种生产”的矛盾性。

^① 本文在现代经济运行的场景中，不区分“劳动力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依照马克思在此的定义，二者的指向是同一的。

(一) 资本积累掌控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管理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数量作为“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马克思,2004a,p.356),这一事实宣告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灭。18世纪后期,欧洲进入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处于历史临界点的马尔萨斯还未意识到,资本主义扩张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人口规律。1843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批驳,后者以人口数量解释经济波动,认为“人口固有的那种其繁衍超过可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恩格斯指出,这种“繁衍过剩”正是马尔萨斯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情况,“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80)在以英国为代表的“人口过密”国家,资本通过“复合劳动力与科学的应用,使土地的生产能力大幅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81)。马尔萨斯的功绩在于使人们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81)。

进入《资本论》体系,人口数量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作用包含对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作用。前者表现为当劳动生产力不变时,只有通过增加并存的工作日(人口数),才能增加剩余价值。“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每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惟一的工作日。例如,如果工人人数为100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么社会工作日就是1000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马克思,2004a,p.356)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马克思援引詹姆斯·穆勒的论述,“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的增长”(马克思,2004a,p.408),人口增长“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p.85),通过劳动生产力增长减少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即贡献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故马克思也将人口的增加称为“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p.85)。

由此,人口数量不仅不是资本主义时代引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马克思,2004a,p.730)反倒是现代工业的存续条件。“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已经就业的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因为

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马克思,2004a, pp. 670-671)马克思指出,甚至连马尔萨斯都承认,工人阶级慎重于结婚,对依靠工商业的国家是有害的,需要储备一定的过剩人口,以便随时“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马克思,2004a, p. 731)。由于现代工业的活跃、繁荣、危机和停滞的周期形式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2004a, p. 729),对可使用的劳动人口的数量管理,就成为资本家及其代理机构面临的一项基本使命。

为推动资本积累的延续,资本不能受限于自然的人口数量及其生殖意愿,而是要“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p. 83),以此确保劳动力对资本的绝对的从属关系(马克思,2004a, p. 881),使工资变动不能从根本上挑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要求。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依靠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技术变革。伴随资本总量增长、劳动生产力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也不断扩大”(马克思,2004a, p. 727),机器大工业将原本栖息于手工业、家庭劳动中的大批劳动人口,从前尚未被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妇女、儿童等,改造为备用的过剩人口(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p. 543)。至此,就业、工资都成为了资本积累的因变量(马克思,2004a, p. 715)。

第二类举措是从制度层面稳定劳动力供给。尽管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高生育率以及机器大工业对传统生产组织的改造,使得当时的劳动力供给增量看起来并不成问题,但是保证适宜的劳动力数量还是要未雨绸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证,南北战争带来的棉花断供,将英国棉纺织业的工人抛向了街头,而当这些工人想要移居海外另谋出路时,工厂主代表波特尔先生提出了异议——相较于逐日损耗、贬值,或由于技术进步而精神磨损的死机器,工人作为活机器“延续的时间越长、历代的技能积累就越多”(马克思,2004a, p. 664),“他们不能在一代之内就被替换,而大部分死机器可以在12个月内被替换和改良”(马克思,2004a, pp. 663-665)^①。《泰晤士报》对波特尔的观点进行了直白的解读,在经济衰退期,国家应当担负起将工人关进贫民习艺所的职责,“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马克思,2004a, p. 665),避免劳动力的流失和损耗,以便在经济恢复期满足资本需要。正如后世学者提出,许多福利国家从不是以阶层之间的再分配为目的,对社会风险的保险才是其核心目标

^① 马克思在此特别加注,当资本意图降低工资时,就会唱完全的反调,如工人如何易于被替换,而机器比工人的劳动重要得多。见马克思(2004a)第663页注释(14)。

(瑟勒博-凯泽, [2008]2020, p. 9)。当面临劳动力再生产风险时,国家为劳动力提供生存空间,保证劳动能力的延续,就是保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延续。

总体而言,从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后期,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器大工业带来的相对过剩人口增加,保证了有利的人口数量条件,国家也开始参与到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度协调中。

(二) 剩余价值生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控制

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控制包含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对消费资料内容、价值和来源的管理,即如何使劳动力终身价值的折损速度对总资本而言更为合算,如何在降低消费资料价值的同时保持劳动力的标准质量,如何既享受市场外家务劳动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补贴,又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对雇佣关系的绝对从属;另一类则涉及剩余价值生产本身对人的自然身体的再塑造,即将身体改造为标准的工作机器的过程(费代里奇, [2020]2023, p. 5)^①。

1. 对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直接管理

18世纪到19世纪初,过长的劳动时间、糟糕的生产环境对劳动力质量造成了损害。在国民健康遭遇威胁,可能危及资本整体利益的背景下,英国的工厂立法于1833年之后陆续出台,通过限制工作日长度、引入卫生和教育条款对生产过程进行制度规范,起到维护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作用,进而推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这一变化又使得劳动力再生产进一步隶属于雇佣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引述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尽管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会给工厂的熔炉造成一定的热量浪费,“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马克思,2004a, pp. 304-305)。由于“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变来计算的”(马克思,2004a, p. 308),因此“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马克思,2004a, p. 602),如果再生产劳动力需要加速代际更替,而劳动力更替速度不够,还需要从外部输入人口,即花费更高的成本时,过度损耗劳

^① 费代里奇指出,相较于福柯将身体所受到的规训置于形而上的“权力”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剖析了资本主义如何将身体改造为工作的机器。

动力对资本而言是非常不合算的行为。因而,对工作日长度的立法限制不仅是对工人阶级的妥协,也是从资本整体利益出发对劳动力再生产质量进行控制的制度安排。

除限制工作日长度外,工厂立法也包含一定的卫生、教育条款。例如,为保证工人呼吸系统的基本健康,“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 500 立方英尺的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马克思,2004a, p. 554),14 岁以下的孩子接受初等教育是其同时进入“受监督”工厂做工的强制条件等。这些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举措,“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马克思,2004a, p. 576)。

这意味着,工厂立法加快了大工厂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建立自身统治秩序的节奏,这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基本质量的斗争,也使劳动力再生产在更大范围内依托于雇佣劳动关系,即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管辖。

劳动力质量控制引发的进一步矛盾是,“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马克思,2004b, p. 350 脚注)。资本降低劳动力价格的意图如何与对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诉求相协调? 同时还要能维持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以便延续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见证了对这一矛盾的治理过程。

其一是对工人消费资料的科学管理。技术进步和海外贸易降低消费资料的价值、分解劳动过程使非熟练工人的学习费用下降、制造廉价的代餐(马克思,2004a, p. 694)等都起到过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作用。马克思援引化学家李比希提及的一段资料,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南美矿工,他们被要求除面包外,必须摄入磷酸钙含量更高的豆子,以维持必要的体能(马克思,2004a, p. 661)。可见,在 19 世纪,化学、生理学的知识已被用于管理劳动力再生产生命政治实践。20 世纪之后,农业、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更广泛地展现了上述作用过程。例如,对农产品生产的工业化改造,将农作物的自然生长时间纳入工业品生产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内,以工厂、餐饮企业生产的标准化食品降低人的饮食成本等。

其二是依靠免费的家务劳动。降低劳动力价值却保持劳动力质量的诉求,可以经由家务劳动的增加而实现。虽然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必须基于市场雇佣关系,并且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概念假定了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在市场上可标准化生产的商品,但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实践经由

家庭这一微观单位,使得再生产始终包含由市场外家务劳动提供的消费品。费代里奇([2020]2023, pp. 108-110)注意到,19世纪后期,产业结构从以轻工业为主向以重工业为主转变,同时泰勒制生产带来了更紧张的工作节奏,这意味着更为健康的身体是工人胜任工作的前提条件。因而,泰勒制的技术体系又将工业革命后被卷入劳动力市场的无产阶级妇女“送回”家中,以更高质量的家务劳动服务于人口素质提升。

但与此同时,家庭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又给资本的最优选择制造了矛盾。处于商品生产之外的劳动力再生产活动,使资本免于对其付出直接成本,然而,家庭花费于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时间,不能完全随劳动生产率进步而减少。例如,尽管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使用、预制食品的出现可能减少用于洗涤、烹饪等传统家务劳动的时间,但是更高的家居环境要求、家庭成员健康管理、科学育儿的兴起,反而带来家务劳动时间的延长(Dike, 2021),即技术进步对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的作用有限,资本既有内在动机持续享受家务劳动的无偿补贴,又试图对再生产过程进行进一步的商品化、标准化改造,在降低再生产成本的同时确保再生产对经济生产的依附。

“广大的雇佣工人能完成 A—G—W 行为,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因此,这种情况要求产品作为商品的流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从而商品生产也已经有了广泛的规模”(马克思,2004b, p. 42)。进入福特制时代,工人阶级必备的消费清单中出现了更多无法依靠家庭独立提供的个人消费品,包括汽车、住房等基本消费资料,也包括医疗、教育等由公共部门支持的集体消费资料。当更为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成为持续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时,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升,既推动政府加入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制度协调,也使得个体愈加无法脱离密集的商品网络实现再生产。对此,南希·弗雷泽([2022]2023, p. 109-110)提出:“这种福特主义一方面将流水线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消费主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支持的再生产联系起来,形成了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的新综合体——波兰尼认为这两极是对立的。”如同在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对资本从形式隶属转向实际隶属,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对劳动力质量进行控制的要求,也推动人口再生产逐渐转向对经济生产的实际隶属。

综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基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反剥削——马克思式斗争,与下文将展开的稳固劳动力再生产的去商品化——波兰尼式斗争(Silver, 2003),在实践中是重叠互动的,福利国家出场带来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去商品化”,表现为对市场机制与社会保护的调和,但同时使劳动力再生产既从功能上符合资本再生产的需要,又受制于现代国家对人口的

精密制度管理,即人口再生产必须受到经济生产的主导。

2. 劳动力自然身体的再生产及其引发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另一类质量管理体现为对劳动力自然身体的再生产。以原始积累为开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不仅意味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建立,还意味着对农民原本闲散的身体的规训。将人的身体变为可以被资本主义生产治理的对象,生产标准的、高流动性的劳动能力,让劳动力顺利转换为经过处理、可以辅助机器生产的能量(蓝江,2024)。

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过程的初步分解促成了局部工人的形成,使劳动力从一个完整的主体变为“从事局部职能的器官”(马克思,2004a, p. 393),是“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2004a, p. 417),局部工人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商品只能由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来提供。局部工人“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马克思,2004a, p. 405)。教育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亦适应于总体工人内部的劳动力等级制度,人的自然身体、自我意识受到现代生产体系的重新加工。随着“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马克思,2004a, p. 453),总体工人也“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马克思,2004a, p. 425),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体被并入客观机体,对劳动者身心的训练以“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马克思,2004a, p. 484)、更便于被劳动条件使用为目标,最终将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马克思,2004a, p. 557)。

随着剩余价值生产依托的技术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不断发展,作为机器组件的劳动力被不断生产出来,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将对身体的严格控制和机械化作为财富积累的关键前提的制度”(费代里奇,[2020]2023, p. 146),开启了生命政治的实践,一系列生物技术与人口政策被用于为资本积累塑造合格的身体,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准则内置于生命中(赵小宇,2024)。19 世纪,用技术修正身体主要表现为外部的机器系统对动作的改造,进而改变肌肉骨骼与人的精神;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各类仿生制品、电子义体被植入身体,人的身体和精神不断经历重新组合的过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的“身体是各类本领和抵抗力量的载体,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与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和代际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它们使身体成为对剥削的自然限制”(费代里奇,[2020]2023, p. 146)。当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实践试图规范化生命时,也持续遭到生命自身的反抗,试图打破 19 世纪以来以蒸汽机为模型,进而发展到计算机和遗传密码的身体观和规训技术(费代里奇,[2020]2023, p. 149)。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人口再生产领域的一些矛盾现象,如激进的跨性别运动、对传统家庭婚育观念的排斥,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个体在生育、照料等领域的“罢工”,也内含了劳动者对现代生产所塑造的与机器同质化的身体的一种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试图标准化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遇到的个体捍卫身体主权、反对同质化和机械化身体的抗争。劳动者对资本积累看似已经拥有主导权的人口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发起挑战,此类斗争与传统的反剥削、争取社会福利的斗争相并行,甚至显得更为突出。

二、波兰尼的人口再生产理论——人口再生产与经济生产的矛盾调和

相较于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规律研究人口再生产的特征,波兰尼将资本主义如何再生产虚构劳动力商品的历史作为直接研究对象,提出了市场与社会双向运动的理论。在波兰尼那里,社会保护运动的发生逻辑包含了人类社会的自由正义与现代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两个层次。

一方面,由市场经济主导劳动力再生产是对人类历史中形成的再生产互惠传统和人的生命神圣性的挑战。不受调控的市场机制向人类社会的无限扩张,使劳动力等虚构商品的再生产隶属于市场控制,但是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内嵌于家庭、氏族、社区的互惠传统,市场化趋势对再生产过程中互惠传统的挑战、对人的自由的侵犯将激起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波兰尼引用了大量人类学文献分析什么是“人”、分析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模式。他提出,“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果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波兰尼, [2001]2007, p. 63)。在其更早发表的文献《论自由》中,波兰尼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研究则直接源于马克思的理论,他认为,“不是人的意志,而是价格决定劳动力的配置。不是人的意志,而是利率指挥着资本。在竞争规律面前,资本家和工人一样无能为力……只有竞争、资本、利息、价格是鲜活而真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而人类的自由意志只是海市蜃楼,只是表象”(Polanyi, 2018)。然而,机器这样没有生命的物体怎么能够掌握活人呢?波兰尼在当时给出了自己旗帜鲜明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要为了(人的)自由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建构市场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国家既建构市场又将市场力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恰恰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制度前提。考虑到劳动

力、土地、货币三类“虚拟商品”的特殊性,如前所述,若交易、自利不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就来自国家权力、政治制度的强制,国家置身于市场的制度设计和管理当中,维护“虚拟商品”市场的制度与运行秩序,有针对性地抵消过度的不平等和贫困及其可能引发的政治行动,即复杂的现代市场一直是以国家的治理术和强制力被置于社会之中的^①。这样一来,市场风险对公民生存权利的威胁引发的自下而上的斗争,也被收编于政府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当中。波兰尼认同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追求将旧的共同体融入新型民主的社会中,提出“尽管受到剥削,工人的财务情况可能比之前好一些,但是对个体和全体幸福最大的不利在于,(市场)正在严重地破坏着人们的社会环境、邻里关系、在社群中的位置以及行会组织;一句话,破坏着他从前的经济存在所嵌入其中的那些同自然和人的关系”(波兰尼, [2001]2007, p. 111)^②,为此需要创建足够多的非市场机制来为每个人提供福祉,对冲市场制造的过多的不平等、贫困和隔离。也正因此,塞勒尼等学者(Szelényi and Mihályi, 2021)提出,波兰尼只是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倡导者,而不是旨在打破世界体系并用重新整合的社会取代市场整合社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如果说,马克思的“生产中心论”明确了剩余价值生产构建人口再生产的规律性趋势,波兰尼的理论却并非真正的“再生产中心论”,在其试图构建的调和理论中,人口再生产到底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人服务于生产为中心,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保护运动如何能保持目标一致?波兰尼似乎搁置了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当前,人口再生产治理的失灵,也使社会保护运动双重发生逻辑之间的矛盾暴露了出来。

针对波兰尼理论中的矛盾,英国学者加雷斯·戴尔([2010]2016, pp. 306-307)指出,波兰尼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可能选择了有利于自身观点的特定时期和地区,对古代社会作出了不恰当的普遍化描述;他的理论缺少“剥削”的概念,忽视了普遍存在的冲突、竞争和权力关系,这使他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道德论证”的色彩;他将 19 世纪社会文化衰败的根源引向劳动力商品化而非剥削,但其实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他低估了国家干预主义作为控制群众抗议的强力工具的作用。此外,正如波兰尼自己提到的,“如果人类社会挑选出某种动机,使之成为组织生产的原则,则‘这个特定动机就代表着真正的人’”(孟捷, 2016, pp. 124-125)。随着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塑造,尤其当“人”已经是被新自由主义再生产的人,传统社会的互惠、共同体模式是否

① 引自弗雷德·布洛克为波兰尼([2001]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所著导言,第 17-18 页。

② 基于中文表述的合理性,本文对译文有所修订。

依然具有神圣性? 布洛维([2010]20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了全球化时代劳工研究中的乐观主义倾向。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远比波兰尼时期更为猛烈。如果市场逻辑已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传统信仰体系的神圣性瓦解,群众发起的社会运动也无法按照预设的轨道进行。在后续小节中,我们将看到,当前人口再生产领域中存在激烈抗争,但是抗争中的多元主体身份、社会利益分化,也让斗争的组织形式与目的趋向碎片化。对此,弗雷泽(Fraser, 2013)提出“三重运动”的概念,即市场化、社会保护与身份解放三者之间的冲突与结盟,甚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份解放运动更倾向于与新自由主义的联合,进一步反对人口再生产中的互惠与关爱,加剧人口再生产的困难。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全球人口再生产的困局既让波兰尼理论中的矛盾凸显出来,也见证了其理论持续的生命力。有学者提出,“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保护运动正以各种形式回潮,占据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制度基础作为政治据点……而这一轮社会保护运动所要纠正、修复和重塑的,恰恰是上一波新自由主义周期带来的全球和各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贫困加剧、经济权力日益集中于全球管理-技术阶层、福利制度衰退、市民社会丧失公共性等多种困境”^①。社会抗争持续涌现意味着“与制度多样性相关联的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多样性——从其动机来看,人并不单纯是物质利益的承担者,其目标函数是多元的,当事人会在物质利益和其他动机之间进行权衡和妥协,并以此来指引其行为”(孟捷, 2016, pp. 124-125)。面对强大的市场力量,人口再生产依然主要建基于家庭等非市场组织,“在波兰尼看来,‘能动’的意义就在于,社会是本体的存在、自主的存在,代表自己行动。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主旨在于对人类的自由权利的坚守,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郭于华和史云桐, 2008)。

综上,双向运动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生产意图生产在数量、质量与行为模式上适宜的劳动力,人口再生产领域则要求抑制市场风险、抵御过度商品化、尊重市场外的家庭等单位的自主运行空间。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未必始终表现为人类历史中市场力量或社会力量谁更占据上风的明确交替,而是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持续的冲突与协调,是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关系或边界的斗争^②。下文通过分析人口再生产活动的特殊性质,将解释为何上述斗争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边界”。

① 郇菁:《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波兰尼时刻与当下中国》,微信公众号“历史与变革”,2022年11月28日, https://mp.weixin.qq.com/s/PBCF3e_m1aq0JB1tmV_uPA。

② “边界斗争”的概念可参考南希·弗雷泽([2022]2023)。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人口再生产理论——人口再生产被经济生产剥夺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朱丽叶·米切尔、玛丽亚罗莎·科斯塔等学者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进入社会视野,围绕着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这一中心,家庭、性别、家务劳动等问题被置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中进行分析,女性在“两种生产”中的角色及其导致的女性受压迫问题,得到了充分的关注(沃格尔, [1987]2009, pp. 14-25)。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针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福利国家制度的衰落、人口再生产领域加剧的商品化趋势等现象,一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资本主义下的性别压迫根植于让社会再生产从属于利润生产的制度,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代表的不仅是性别层面的女性立场,更是所有被压迫者面临的问题,斗争的场所不仅有工厂,也包含健康、教育、住房等人口再生产必需的一切劳动和服务领域(Arruzza et al., 2018)。针对生产与再生产“二元论”中可能存在的等级关系,以及当代经济中生产与再生产边界趋向模糊的现象,宋少鹏(2024)关注到多类型的生产关系形态以及社会实践中存在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复合体,特别将目光聚焦于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生产与生活的紧密联结,探索了将生产回嵌到生活的现实需要与其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附属性的、处于被动改造地位的人口再生产问题置于观察的中心,直面人口再生产的真实过程及其性质。由于人口再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围绕着生育、照料责任等活动展开;加之女性在再生产分工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前个体从生育、照料等再生产责任中退出似乎表现为女性的抗议,使再生产矛盾表现出了较强的性别冲突色彩。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人口再生产的社会能力弱化,不是表面的女性权力斗争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人口再生产这一人类社会自然基础的持续掠夺与改造,削弱了所有人投身于再生产中的能力。

首先,人口再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存在自然性质差异,难以用生产逻辑规划再生产。前文对马克思人口再生产理论的回顾显示,资本主义发展是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生产的隶属性加强的过程。传统社会的家庭同时是生产与再生产单位,现代社会的家庭转为主要承担人口再生产职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不仅包含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也是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分离过程,是以生产为中心,生产与再生产二元等级关系形成的过程;是可标准化的、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统治生活的过程,也是非标准的、提供使用价值的家庭

内再生产劳动被矮化和被剥夺的过程。有学者提出,当商品拜物教关系系统治社会,价值与抽象劳动取代人类成为主体,商品经济的现代父权制就被建立起来。处于中心位置、公共领域,由男性主导的是价值生产,动力规则是竞争作用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压缩;与之相对的是处于外围地带、私人领域,由女性主要承担的家务劳动,运行模式是情感支持下的密集照料、关爱时间的延伸。商品拜物教关系下的价值分离即昭示了当代社会的人口再生产危机,经典马克思主义聚焦于与私有制关联的不平等关系,而再生产困境源自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本身,这种困境难以用传统左派或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来解决^①。

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时间、效率准则开始冲击人口再生产的逻辑,这一进程又在数字技术时代被加速,相对清晰明确的工作任务、可复制的标准化操作流程不断改造再生产领域(李洁,2024)。照料、情感支持等原本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再生产劳动面临被社会分工转化为商品关系,而附着于典型工业制成品生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行为激励和评价准则,在对再生产劳动价值的评价中是失灵的。难以想象,用越短时间完成对儿童或老年人的照料、越快速对个体提供一定情感安慰的再生产服务将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再生产劳动提供的使用价值性质,使此类劳动不适用于价值规律的评价,以生产逻辑评估再生产,加剧了对个体投入此类劳动的负向激励。对此,宋少鹏(2024)提出,当前改善再生产问题,需要的是把再生产的意义从劳动价值论对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出生产中心视角下对再生产的“承认与再分配”,找回“生活中心”。

其次,生产与再生产中的性别分工演变加重了女性面临的双重负担,直接加剧了对再生产劳动的挤出。伴随着工业革命技术扩散,家庭手工业趋于瓦解,女性被裹挟到产业后备军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总体上倾向于认为,尽管妇女加入工厂生产的初始场景十分糟糕,如恶劣的劳动环境、缺少照料的儿童面临更高死亡率,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使妇女获得家庭以外的经验和组织,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形式提供了经济基础(Cox, 2020)^②。与之相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普遍认同,资本主义打开家门,将女性推入劳动力市场,这一过程并非天然地开启女性解放的进程,而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打造了基于性别、种族和年龄的等级秩序^③。女性劳动力在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双重职能,使无

① 罗斯维塔·舒尔茨:《父权制和商品社会——没有身体的性别》,微信公众号“Kritik 人文社”,2024年6月22日, <https://mp.weixin.qq.com/s/BNdNC-z7OLS3HR31ZphUEA>。

② 译文参见朱迪·考克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为妇女解放而斗争》,微信公众号“Kritik 人文社”,2023年10月24日, <https://mp.weixin.qq.com/s/QB1JxdMOp21GRf3WgOFa2Q>。

③ 奥布莱恩:《家庭会被消灭吗?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家庭观念变迁》,微信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2021年2月22日, <https://mp.weixin.qq.com/s/w0tbgeOVOURXwnnJIX7lcA>。

产阶级内部一开始就延续并以新的形式强化了性别分化。将女性囿于家庭还是作为产业后备军,资本倾向于根据主导技术类型、资本积累的需要,保留足够的选择权。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代际更替与质量维护以生育和家务劳动供给为基本条件,随着人口再生产领域社会化程度提高,家庭内的劳动过程趋向科学化——安排营养均衡的日常膳食、保持良好的家居环境,以及科学育儿等理念都让家庭再生产的职责加重。

最后,再生产领域商品化程度提高,助推“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进一步削弱人口再生产意愿。二战后福特制下的资本主义以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家庭消费为特征,需要更为健康、规训的劳动力再生产,与之适应的福利国家制度,重建了“家庭工资”模式——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多居家提供高质量家务劳动,在费代里奇、弗雷泽等学者看来,这种国家与父权制的联动重建了“工资父权制”(戴雪红和吴家丞,2023),强化了传统性别秩序(Fraser, 2016),而以经济生产“协调”人口再生产,暂时缓解“两种生产”矛盾的做法,随着福特制瓦解而崩溃。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登场,“家庭工资”模式退出,双职工家庭增加,女性重新被投入到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包括照料、教育、健康、医疗等加速商品化,为剥夺性积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个体也为此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与繁重的养育照料职责,两方面压力共同催生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Littler and McRobbie, 2022)。其主导下的女性解放话语更多基于对市场、精英制度和个人努力的信仰(Fraser, 2013),期望在市场竞争的金字塔结构中攀升以获得更多权力,试图“以父权制的工具拆除父权制的房子”^①。类似于“母性暴政”的话语,强调了家务劳动、育儿作为“苦役”,推动了个体退出照料活动;所谓“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话语混同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的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活动天然不同的属性,亦无力通过制度变革与组织支持解决家务劳动带来的压迫与疲惫问题(McRobbie, 2020)。

综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人口再生产问题置于观察的中心,不同于“生产中心”或资本主义主导下“二元结构”中“再生产”的附属地位,通过直面“再生产”的真实过程与其反抗动能,可以发现,所谓性别矛盾的一个关键指向正是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矛盾。由于“两种生产”性质的根本差异,经济生产对人口再生产的改造,长期来看,趋向于削弱再生产的能力,加速经济危机向社会整体性危机的蔓延。

^① Nergiz De Baere, “The Next Wave of Feminism is Matriarchy”, <https://chixmag.com/editorial/the-next-phase-of-feminism-is-matriarchy>, 2025 年 6 月 1 日访问。

四、人口再生产危机表现及其成因的综合分析

综合以上理论视角，从“生产中心”即人口再生产隶属于经济生产的角度看，经济运行的矛盾将直接渗透于人口再生产；资本加速积累的过程，包含着资本有机构成长期上升趋势导致的就业不足常态化，以及资本间激烈竞争带来的利润减少、资本闲置、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等，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从而导致人口再生产危机。从“再生产中心”即人口再生产是经济生产的自然基础来看，人口再生产的自然过程被资本积累破坏，剩余价值生产建构的人的时间观念、消费行为、竞争与效率意识等，与人口再生产自然的生命周期、需求满足、关爱与同理心相矛盾，致使更多人撤出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活动，人口再生产的萎缩是难以避免的结果。在波兰尼的理想状态中，对人口再生产的制度保护，可以达到维护经济正常运行与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双重目标。然而，人口再生产危机的出现恰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失灵，经济与人口矛盾难以调和。

表 1 概括了分析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矛盾关系的三种理论视角，后文将在此框架下，对人口再生产危机的具体表现与成因作进一步分析。

表 1 马克思、波兰尼、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关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矛盾关系的比较

	马克思	波兰尼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底层逻辑	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	人类社会的道德正义、现代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	人口再生产是一切社会经济的自然基础
基本特征	剩余价值生产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控制；人口再生产隶属于经济生产	制度协调抑制社会风险与不平等，稳固经济社会运行	再生产对生产的附属和被剥夺；女性在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双重负担
社会运动	以反剥削为中心的阶级斗争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抑制商品化程度的斗争	再生产领域的冲突，以性别、种族等形式表现的身份运动
人口再生产危机的基本原因	经济运行的矛盾导致人口再生产危机	市场力量过强，社会保障运动不足	资本积累对人口再生产自然属性的破坏；商品化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反照料特征
发展趋势	生产方式变革作用下的 人口规律演化	市场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边界斗争	再生产矛盾激化推动生产方式变革，走出“两种生产”的二元对立

(一) 人口数量管理失效

工业革命后，西欧地区的人口模式一度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

长率的特征,且这一时期机器大工业生产对传统手工业生产的排挤也在持续制造产业后备军,如前文所述,这正是马克思笔下资本积累确保了对劳动力有效数量管理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发生在马克思去世之后。19 世纪末西欧地区首先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模式,究其原因,从医疗卫生水平看,婴儿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增加、现代避孕方法的运用等都是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影响因素(哈珀, 2022);从经济社会发展看,低生育率更早出现在工业化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因而生产力进步为居民带来的多样发展空间、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增加、生育机会成本提高、婚姻家庭的观念转变等,也都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生育率初步下降的重要原因。

生育水平的进一步转折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达经济体的总和生育率逐步跌至 2.1 的人口更替标准水平以下,至 2005 年下降到 1.6 左右,同一时期新兴经济体的生育率也快速下跌,2023 年新加坡、韩国的生育率分别仅为 0.97 和 0.72,且当前人口学家普遍预测全球低生育率持续深化和蔓延的趋势,到 2100 年只有 26 个国家的人口处于正增长(GBD 2021 Fertility and Forecasting Collaborators, 2024)。

如果说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生育率第一阶段的下降与生产力发展赋予个体的多样选择空间相关,本世纪以来生育率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标准水平,青年一代极低的生育意愿,则被认为主要源于过高的生育成本 and 市场竞争压力^①。经验上,在工业化国家中,社会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一度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学者们提出,有效的福利制度能促进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提升居民的生育信心(蔡昉, 2024)。举例来看,法国曾被认为是以较高的公共育儿支出稳定生育率的典型案例。2019 年,在全部 OECD 国家中,家庭补助公共支出占 GDP 的均值为 2.29%^②,法国当年则达 3.44%,美国为 1.04%,与之对应,法国总和生育率为 1.83,高于 OECD 国家的均值 1.60,同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为 1.71。然而,经济补贴的有效性在近年来也愈发值得怀疑,法国自 2010 年达到近三十年生育率的峰值 2.02 之后,其生育率持续下降,2023 年为 1.66,美国则为 1.62。与美国作对照,法国明显慷慨的家庭补助带来

① 资料来源:《人们不生孩子的真正原因》,微信公众号“利维坦”,2024 年 8 月 20 日, <https://mp.weixin.qq.com/s/XC5O-m5asVRXqSkeQ65sYg>。其中提到,2018—2023 年,50 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中表示他们不太可能生孩子的比例达到了 47%。原文作者 Christine Emba,原文详见 <https://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24/08/fertility-crisis/679319/>。

② 关于 OECD 数据库提供的家庭公共支持数据,统计口径为儿童津贴和补助金、育儿假福利以及托育服务支持。健康、住房等其他社会政策领域的支出同样惠及家庭,但这些支出并非家庭专属,因此未被纳入统计范围。

的生育率优势可能还不够显著。类似情况的还有瑞典,2015—2019年瑞典公共支出的家庭补助占GDP比重约为3.45%,但同期其总和生育率也只在1.75上下,2023年更是下降至1.45,低于美国同年的生育率水平(1.62),而美国2021年由政府支付的家庭补助占GDP比例仅为0.622%,相比之下瑞典的这一指标保持在3%以上^①。经济补贴对生育意愿正向影响的减弱,提示低生育或许不仅是个体面临的经济负担问题,也包含经济运行整体结构及其关联的意识形态,对居民照料意愿的根本性改变。而持续低生育率也意味着,经济生产从自然的人口增量中获取产业后备军的潜力正在下降。

(二) 人口质量控制效果弱化

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发展伴随着对满足剩余价值生产要求的标准质量劳动力的塑造,但是近年来居民各类健康风险的增加也在挑战这种质量控制的有效性。

表现之一是居民肥胖率的提高。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4年发布的报告,1990年美国20岁以上居民的肥胖率为12%,2017—2020年这一比例达到41.9%,期间严重肥胖率达9.2%,超重对个体施加了严峻的健康风险和高额的医疗成本。58%的超重人口患有高血压,23%患有糖尿病,2019年超重者的年均医疗成本要比正常体重者高1861美元^②。

表现之二是精神疾病发生率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精神痛苦率”显著上升(费舍,[2009]2024, pp. 68-69)。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发布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2019年,全球近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中抑郁症患者超3.5亿,焦虑障碍患者约2.64亿,全球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从2010年的3.59%增长到2019年的3.76%^③。作为OECD数据库中居民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韩国居民自杀率的明显上升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1985—1995年韩国每十万人口的自杀率从11.5升至12.7,低于同期的日本、美国、法国,2001年之后这一指标开始快速上升,2010年达到35,远高于其他三国,2020年下降到24.1,但依然明显高于其他三国同年的水平^④。

与身体和心理疾患关联的一个因素是成瘾性饮料与药物消费的增长,据OECD数据库的统计,2012—2023年间,韩国15岁以上居民年均酒精消费量为

① 以上数据皆来自OECD数据库。

② <https://www.cdc.gov/obesity/adult-obesity-facts/index.html>。

③ 该报告还显示,平均而言,各国用于精神卫生的预算不到其卫生保健预算的2%。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所在国家每20万或以上人口才有一名精神科医生。

④ 根据OECD数据库数据整理。

8.44 升,日本为 7.1 升,中国大陆地区为 5.2 升^①。作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年饮酒量最高的国家,韩国居民的高酒精消费,也被认为受本文关注的两重因素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在企业组织严苛的等级秩序中,酒精充当了上级规训下级的手段;二是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较大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导致居民增加对酒精的消费。此外,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为延长学习时间和缓解压力而依赖兴奋剂甚至吸食毒品的情況^②。

在健康风险增加的同时,个体还陷入了另一重困境——健康管理能力取决于个人支付能力。就肥胖而言,由于肥胖的发生与饮食等消费方式紧密相关,与较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者在食物选择与科学的体重控制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学者劳伦·伯兰特提出,经济收入的高低决定了美国人对自己身体行使主权的程度,肥胖实则是一种身体主权的病态,却被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归结为个人在健康管理上的无能(周彦华,2024)。与精神痛苦、注意力缺陷等诊断增加相伴随的,是精神类药物的消费增长。精神疾病本身成因复杂,与个体的生物学特征以及社会经历等多方面因素相关。但是,当前的主流诊疗措施存在剥离社会因素、着重从生物学角度处理精神疾病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药物治疗,助推了医药企业的盈利,却愈加偏离建设心理健康支持性社会环境的目标^③。故而有学者提出,心理治疗开始于对资本主义非人特征的反思,但逐渐形成的专业化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情感疏导和药物治疗,建立了一种标准的社会情感表达机制,情感本身被物化、疗愈被商品化,这种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网络当中,这也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理性化和冷漠(高红明,2023;易洛思,[2007]2023)。

(三) 社会照料能力减弱

低生育率现象、健康管理能力随收入水平分化,这二者本身是全社会照料能力下降的表现,并且相较于低生育率等问题,照料不足更为普遍且更具矛盾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科学育儿、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家庭部门投入的

① 根据 OECD 数据库数据整理。

② 相关资料来源:《东亚第一酗酒国,彻底摆烂》,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2024 年 7 月 3 日,<https://mp.weixin.qq.com/s/WAgJ1zOOWYMMOK9wWy6z0A>;《开年大尺度爆款韩剧,戳中东亚小孩“不赢就没爱”的恐惧》,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2025 年 2 月 21 日,<https://mp.weixin.qq.com/s/leAytjl5zfHPwvB7bSwpng>。

③ 罗伯特·惠特克:《剖析流行病:灵丹妙药、精神类药物以及美国精神类疾病的快速增长》,2020 年 10 月 17 日,<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as-the-drug-based-approach-to-mental-illness-failed/>。

照料时间在增加,甚至国家对家庭部门的补助开支也未显著减少,只是相对于社会成员需要的情感支持、风险庇护等,全社会投入的照料资源和时间对持续照料意愿和能力的推动似乎不足。例如,调查统计显示,美国母亲每周育儿时间从1985年的12小时增至2010年的21小时,同期,父亲的育儿时间也从每周4小时增至8小时^①。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育儿理念更强调父母在子女教育和情感连接中的高投入。由于家庭承载的人口再生产功能服从于生产方式的人口需求,在经济生产构建人口再生产的一般框架下,与之适应的教育、育儿理念将劳动力市场的评价准则与规训方式前移至家庭中,进一步强化父母的育儿投入和教育焦虑,使儿童照料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同时,政府部门投入的照料资源也并未绝对减少,就OECD成员国公共支出的老年与抚恤补助占GDP比重来看,1980—2021年该指标占比均值从5.5%上升到了8.0%,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公共支出的残疾和疾病补助占GDP比重从1980年起至2021年保持在2.1%上下。公共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20.5%上升到2024年的21.2%^②。面对低生育、老龄化与人口身心健康隐忧加剧,可预期的相关公共支出长期负担还会保持增长。

然而,一边是全社会客观上照料负担与成本投入的增加,另一边是个体主观上的低生育、低照料意愿趋势,其原因依然嵌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矛盾关系体中。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吴秀瑾提出,现代教育发展以培养合格的劳动力为首要目标,以传授生产和公共领域的知识为重心,家庭生活领域和照料劳动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尽管各个层级的教育都设置了一定的“家计”劳动课程内容,但结果普遍流于形式^③。随着再生产对生产依附性的增强,青年一代更为缺乏在家庭生活中的必要技能,期望依靠市场分工解决家庭生活中的照料困境,其结果加速了照料劳动的商品化,迎合了剥夺性积累对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圈占。然而,照料走向专业化依然面临着明显的边界限制,如个体支付能力差距加剧再生产领域的不平等,标准化的再生产劳动难以应对情感需求等。有学者关注到资本主义的内在反照料特征,即鼓励人们自食其力,鼓励无止境的相互竞争,导致漠视他人的苦痛和脆弱。在这样的社会里,对自身和亲人的照料变为对家庭资源的考验(Kleinman,2019)。

此外,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照料类工作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极为有限,其工作组织模式、质量评价标准与典型的制造业和商业活动截然不同,在职业

① 参见 Parker and Wang (2013),原文数据测算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美国时间利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ATUS),<https://www.bls.gov/tus/>。

② 根据 OECD 数据库数据整理。

③ 《女生在想什么? 中正吴秀瑾从“关怀伦理学”谈不一样的女性主义》,2023年9月27日,https://humanityisland.nccu.edu.tw/wushiuching_a/。

分工序列中照料类工作往往处于更低的职业等级,从业者更为缺乏组织和福利保障。在对美国匹兹堡经济与就业结构转变的研究中,学者维南特([2021] 2023)指出,匹兹堡照料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相关工作者过度的劳动、极低的薪资与不被承认的社会权利。总之,由于照料类工作天然的低生产率、非标准化特征,其更容易被置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以商品交换的思路提供照料服务,难以真正提升照料质量、缓解照料供给的不足。

(四) 人口再生产领域冲突加剧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社会运动除劳资间阶级斗争外,更多地加入了性别、种族、环保等领域的斗争。两相比较,前一类斗争是以生产中的矛盾为中心,后一类斗争则多聚焦于人口再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与风险。究其直接原因,城市化进程中分化的都市空间加剧了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分割,推动居民争取教育、住房等再生产资源的抗争;性别间、种族间冲突的增加大多可以关联至人口再生产责任分担与资源分配的不均;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的盛行,进一步凸显了资本主义固有的性别、种族、殖民主义等不平等问题。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西方国家较为普遍地出现了公民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转化。在本文关注的视野中,身份政治运动兴起的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矛盾的升级,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劳资矛盾激化、但工人阶级斗争能力变化后呈现出的社会运动形态,同时也是人口再生产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斗争中涌现出的新矛盾甚至在加剧人口再生产危机。

第一,就业灵活化冲击再生产的稳定性,推动身份政治兴起。20 世纪 70 年代后,伴随信息通讯技术革命,后福特制生产网络帮助核心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重建低成本产业后备军,多数劳动者只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承担数量弹性功能,长期处于就业不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推进剥夺性积累,提升劳动力再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使得劳动力再生产对经济生产的隶属性更强。相较于战后黄金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需要双薪家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重新提高。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灵活化生产网络持续扩张,平台对劳动过程的记录与评价更为精密,对潜在劳动力的调度更为便捷,劳动者时刻感受到激烈的时间角逐,竞争逻辑渗透到生产乃至再生产的日常当中。学者奥布莱恩在对资本主义家庭模式演变的研究中提出,对传统异性恋家庭造成冲击的不是女权主义和性少数群体的运动,而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劳动力整体对工资的依赖性增强,个体对传统父权制家庭的依赖下降,有更多机会退出异性恋本位和父权制暴力,家庭模式趋向于多元化,但是所谓自主的亲密关系选择依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受到雇佣劳动关系不稳定

性的限制,在经济的制约下,关爱友谊的网络常常会崩溃^①。

第二,人口再生产斗争的组织与诉求分化。随着互联网全面重塑生产组织与日常生活、数字技术加剧劳动异化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居民从工作模式到日常生活都发生了一定的物理间隔,传统的车间组织力量趋向下降。具体来看,与阶级政治相区分,身份政治以性别、族裔等特定身份的共同经历为“组织基础”,展开基于特定身份诉求的抗争,但以女性、少数族裔等为主的斗争主体,正是产业后备军的典型成员,也正是不稳定就业下加剧的生存不平等风险,将这些群体推向街头;同时,移动互联网的深度使用,以更低的交流成本连接了更多社会成员,可以形成更强大的集体力量。但是这一集体聚合的过程同样包含反向的作用力:其一是生产组织方式灵活化使参与者更难产生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如美国学者沃利对后工业时代芝加哥阶级关系变化的研究提到,虽然钢铁工业剥削并加剧了各族裔间的分歧,但它也迫使居民们一起工作,不管工人们喜不喜欢,都得在工厂里相处,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类似的经历能够让人们跨越鸿沟、相互认同了(沃利,[2013]2024);其二是互联网重构人们的生活、想象和话语,“社会经验被重新配置为一个由诸多碎片化的异质性元素组成的拼贴”,“用户可能会在那些耸人听闻且离奇的文章下停留更长时间并充分参与其中,因为此类信息能与他们的焦虑和不满产生共鸣”(默多克,2022)。在碎片化信息的裹挟中,网络制造的繁多身份标签,既加速了“同类”间的快速辨识与情感支持,也使所谓“异类”间的差异和竞争被放大,使参与者更难以形成集体共识。

第三,人口再生产领域的斗争本身成为加剧再生产危机的因素。在基于传统大工厂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能量下降的同时,一些社会运动放弃了对“无产阶级作为变革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信仰”(豪伊,[2007]2009),增加了对不平等的后现代文化批判。例如,身份政治运动原本聚焦的是由社会身份差异引发的经济机会不平等、人口再生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剩余价值生产试图制造的同质化的劳动力身体。但是如果它不去“冲击既有的生产和分配结构”(赵丁琪,2024),不试图真正应用广泛的社会化生产网络,建立更大范围的集体力量,当基于特殊身份的价值诉求背离对现行生产方式的反思,结果也使得身份政治沦为被把玩的政治工具,“甚至对少数群体的扶植政策反向激发了右翼民粹主义现象”(陈文旭和刘涵,2023)。在教育界、大众媒介上出现教条化的“政治正确”、形式主义的性别和种族平等的同时,反女性主义的保守主义政策、少数族裔就业质量的进一步下降也同步上演(贺翠香,2023)。身份政治斗争尽管集合

^① 奥布莱恩:《家庭会被消灭吗?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家庭观念变迁》。

了众多参与者,却呈现出群体间的分裂,以及一定的反照料、反人口再生产倾向。随着社会运动中性别议题的增加,有一些观点将低生育率等人口再生产困境视为女性主义扩张的结果,恰恰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没有认识到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口再生产的挤压,是生产与再生产两个领域矛盾的日渐不可调和塑造了这一社会运动的局面。

综上,低生育率、居民健康风险增加等现象意味着工业化时代以来资本积累曾建立的劳动力数量、质量控制能力弱化;全社会用于照料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增加,但实际照料意愿和能力不足,围绕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斗争表现出更强的“反再生产”趋势。以上集中凸显了人口再生产与经济生产的矛盾激化,资本主义国家尚未能恢复对劳动人口这一生产条件的有效维护。

五、生产方式演变重组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关系的机会空间

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激化人口再生产矛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生产方式演变中两种相反趋势的矛盾作用,一种如上所述,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推动资本、技术、劳动力更快速的流动,福特制生产由国家和大型企业建构大规模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模式已缺乏现实基础(蒙克,2024),向技术封建主义退化的隐忧,更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基于特定社会身份属性食租的心理,制造锐化的身份边界;但另一趋势是,社会化生产网络促成更大群体的聚合,与现行的市场竞争体制、社会成员间的分化相反,自动化与智能化生产扩张,又潜藏着以剩余价值或利润为中心逻辑的生产关系走向衰退的趋势,锚定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可能正在进入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终极危机^①。

生产方式的加速演变正使得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重组面临着新的机会空间。具体来说,其一,广泛的社会化生产网络形成,扩大了与核心资本相对立的劳动者的队伍,并模糊了原本生产与再生产二分的界限。如哈特、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17)等学者的研究提出,面对非物质生产、情感劳动增加,协作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劳动场所内进行,资本积累超越了传统工厂的生产过程,劳动不局限于雇佣劳动;但是,当一切社会群体都受到资本的剥夺,革命主体将不再局限于男性产业工人,而是所有社会群体,广泛的社会化生产网络,也将支持由民众重建公共性,对抗以资本为中心的私有制模式。受其影响,意大利自治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将家庭看作新的社会工厂的核心,承担家务劳动的

^① 关于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的讨论,参见詹森([2022]2024)。

女性就是社会工厂中的工人,是具有革命潜能的社会工人。伴随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增加,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的融合成为更强的趋势。如果说曾经面向市场的生产劳动与家庭内非生产劳动的二元划分,限制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并抑制其革命能量,那么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社会工人”的形成,将对抗资本增殖试图纳入一切新的劳动形式的冲动(梅扎德里,[2019]2023)。

其二,智能化生产持续推进,理应使得耗费于价值生产的劳动时间减少,个人的自由时间增加,被用于丰富的生命体验。可以预期的是,随智能化生产对现有生产系统的全面改造,大规模投资的物质基础将趋于萎缩,资本积累中劳动者的数量弹性功能减弱,所有面向物质生产的部门会率先经历价值生产和利润增长的极限。面对技术体系演变、老龄化趋势和个体情感需求增加,我们的社会将能够容纳更低的劳动生产率,而不再是以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也正是到这一时刻,学校教育、社会组织更可能将家庭生活、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活动作为重要课题,更突出照料活动的意义^①。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就业结构重大变革、改变一整套价值生产和交换的评价标准的进程中,我们有机会将发展的中心真正置于对人的关注。

然而,如果生产关系的属性依然是获取剩余价值,这就将强化其制造新的商品类型和工作组织模式的动机,将原本可以解放出来的“非必要”劳动时间改造为剩余劳动时间,强化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工具的属性。生产力原本的趋向是,随智能化网络搭建,物的稀缺性下降,人与人形成更紧密的情感连接;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造的趋势是,物对人的替代与掌控,人对激化的社会竞争的预期。当使用价值的生产和获得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以交换价值为中介,公众却被制造出对交换价值更为“稀缺”的想象,更不愿从事服务于家庭和各类再生产活动的使用价值生产。

溯源人口再生产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源,可以发现,当前的人口再生产危机也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匹配性增强这一典型矛盾。机器生产、人工智能的作用,逐渐会减少用于常规物质产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然而节约下来的时间不仅没有直接转化为照料时间,反而由于失业威胁和不稳定就业的增加,加重了照料不足;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人口,进入由商业逻辑主导的人口再生产服务行业,亦未能改善全社会整体上的照料困境。这是因为,以技术理性建构日常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复制了生产过程的竞争和价值评价标准,与人口再生产以共情和使用价值为基础相违背。在《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中,学者维南特([2021]2023)讨论了政治变革和共同体重建对人口再生产的重

^① 《女生在想什么? 中正吴秀瑾从“关怀伦理学”谈不一样的女性主义》。

要性,提出在一个更民主和平等的社会里,人人都将得到照料,并参与到对他人的照料中去的观点。人口再生产危机提示这种变革的迫切性,而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意味着原有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价值评价系统彻底变革的可能。关键在于,以生产关系革命去承载新的技术体系,使更包容人口再生产的集体重建成为可能。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互动框架中,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危机的形成,提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经济生产试图完全塑造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激发的矛盾使人口再生产趋向萎缩,表现为低生育和低照料意愿、居民健康风险等问题。一边是人口再生产的物质需要和情感满足等更依赖商品交易,就业质量对人口再生产的支撑作用更加关键;另一边是金融化与数字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不稳定就业、更长劳动时间、经济波动、贫富分化等问题。劳动者面临就业质量下降的常态,直接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下降。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对人口再生产的协调性制度作用趋向失灵。此类制度设计原本既要稳固市场秩序,又要保障人的生存;制度的有效性,需要政府自上而下与群众自下而上的“社会保护”目标汇合。然而前者急于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后者寻找自由与安全,当下二者间缺乏一致的现实基础。不仅经济增长乏力限制了劳资间的妥协空间和福利制度的物质补偿水平,资本主义技术体系演进在拆除大规模生产体制的同时,也瓦解了与之对应的福利国家标准化的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照料的集体支持网络趋于瓦解,资本积累内在的“反照料”特征愈加显现,重建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平衡点以维护旧生产方式运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被削弱。

第三,人口再生产领域的抗争形式、诉求多样化,但是出现明显的身份与利益分化,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生产与再生产有机互动这一基础。由于人口再生产本身的自然属性,我们既无法以生产中心论,期望依靠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增长自发解决人口再生产的困境,但同时,现代社会以来人口再生产已经被经济生产深刻地重塑,人口再生产领域的困境恰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高度关联,我们无法脱离现行经济社会秩序中的生产基础,赋予再生产独立的变革空间,矛盾的协调只能寻求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作为一个复合体的协同变化。客观上,需要肯定人口再生产领域斗争的意义,它使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危机显形,使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关系革命更为紧迫。针对人工智能

等技术演进趋势,需要以生产关系革命发掘新技术解放劳动力的潜能,彻底改变劳动者在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中的工具性角色。如果生产端的公共、共享属性更强,人口再生产领域也有望回到对集体、关爱更强的认同。

在全球人口再生产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同样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等趋势性特征,积极化解人口形势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制约关系,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同,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支撑条件。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正是通过促进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谋篇布局。

具体而言,针对生产领域,直面人工智能技术、平台组织方式对传统就业模式、劳动关系等的新挑战,首先要加强对优质人力资源的培育,提升劳动者对智能化和网络化生产体系的适应性,发挥劳动主体性作用(张宇,2024),增强劳动者技能的用武之地,促进劳动者技能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间的积极互动;其次要推动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就业包容性,避免过长劳动时间和过于不稳定的就业,稳定劳动者预期,提振劳动者的发展信心;第三要增强劳动者对劳动生产率进步收益的分享,实现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消费、投资间的正向互动,扩大内需体系、畅通经济循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要以稳健的经济增长协调再生产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针对再生产,就业模式变换已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巨大挑战,需要适应新业态灵活就业的增加,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探索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试点等,有效隔离市场风险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要继续增强教育、医疗、养老、育儿等公共服务的普惠和优质供给,避免再生产领域关键消费资料过度商品化导致的居民健康水平、发展机会差异和社会矛盾等。近年来,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充分认识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推动新时代的家庭建设,对于难以通过细化的市场分工解决的生育、照料等人口再生产责任分担,积极探索党领导下“国家—家庭—社会”相均衡的人口治理结构(胡湛等,2022),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民生共治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充分调动各种潜在社会资源,避免单纯依赖财政投入,构建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人口再生产支持体系,这些实践正在为解决全球人口发展领域的难题提供中国经验。

总之,直面当前技术变革与人口转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发挥劳动者在生产与再生产两方面的主体作用,推动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就业创造,加强全社会的民生共建共治共享,将不断增强居民的发展信心与照料能力,促成经济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协同。

参考文献

- 蔡昉. 2024. 社会流动性如何影响生育率? [J]. 社会学研究, 39(1): 45-63, 227.
- Cai F. 2024. How social mobility impacts fertility? [J]. Sociological Studies, 39(1): 45-63, 227. (in Chinese)
- 陈文旭, 刘涵. 2023. 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研究述评[J]. 国外理论动态, (3): 162-170.
- Chen W X, Liu H. 2023.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identity politics [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3): 162-170. (in Chinese)
- 大卫·詹森. 2024. 资本主义的消亡: 终极危机与价值实质[J]. 徐天意, 译. 国外理论动态, (4): 99-109.
- (original language) Janzen D. 2022. The ends of capital: terminal crisis and the substance of value[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30(2): 29-55.
- 戴雪红, 吴家丞. 2023. 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当代批判——基于费德里西的自治主义的女性主义视角[J]. 国外理论动态, (4): 59-68.
- Dai X H, Wu J C. 2023.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capitalist patriarch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derici's autonomist feminism [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4): 59-68. (in Chinese)
- 高红明. 2023.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困境——兼评易洛思的情感资本主义理论[J]. 中国图书评论, (10): 30-39.
- Gao H M. 2023. The emotional predicament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a review of Illouz's theory of emotional capitalism[J]. China Book Review, (10): 30-39. (in Chinese)
- 格雷厄姆·默多克. 2022. 对抗的联结: 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J]. 张艾晨, 杜怡蒙, 译. 开放时代, (1): 193-209, 10.
- Murdock G. 2022. Contested connectivities: pandemics and platform capitalism [J]. Zhang A C, Du Y M, trans. Open Times, (1): 193-209, 10. (trans. into Chinese)
- 郭于华, 史云桐. 2008.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J]. 开放时代, (3): 141-151.
- Guo Y H, Shi Y T. 2008. Marxism and society—the enlightenment of Burawoy's “sociological marxism” [J]. Open Times, (3): 141-151. (in Chinese)
- 贺翠香. 2023.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性别身份问题[J]. 国外理论动态, (4):

69-76.

He C X. 2023. The problem of gender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feminist studies[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4): 69-76. (in Chinese)

胡湛, 彭希哲, 吴玉韶. 2022.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J]. *中国社会科学*, (9): 46-66.

Hu Z, Peng X Z, Wu Y S. 2022. On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eing[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9): 46-66. (in Chinese)

吉莲·豪伊. 2009. 后现代主义之后:回到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J]. 江洋, 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4): 159-166.

(original language) Howie G. 2007. After postmodernism: Feminism and Marxism revisited[J].

加布里埃尔·维南特. 2023. 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M]. 刘阳,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original language) Winant G. 2021. The next shift: the fall of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health care in Rust Belt Americ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加雷斯·戴尔. 2016. 卡尔·波兰尼: 市场的限度[M]. 焦兵,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original language) Dale G. 2010. Karl Polanyi: the limits of the market[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卡尔·波兰尼. 2007.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original language) Polanyi K.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 Boston: Beacon Press.

克里斯蒂娜·J. 沃利. 2024. 无地可依: 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M]. 张伊铭,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original language) Walley C J. 2013. Exit zero: family and class in postindustrial Chicago[M].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蓝江. 2024. 从劳动力到人-机主体性——如何思考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J]. *理论与改革*, (5): 69-81.

Lan J. 2024. From labor force to human-machine subjectivity: how to understand biopolitic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J]. *Theory and Reform*, (5): 69-81. (in Chinese)

李洁. 2024. 社会再生产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的两条可能路径[J]. *妇女研究论丛*,

- (4): 20-25.
- Li J. 2024. Two probable pathways for combining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with empirical research[J].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4): 20-25. (in Chinese)
- 莉丝·沃格尔. 2009.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趋向统一的理论[M]. 虞晖,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Vogel L. 1987.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马丁·瑟勒博-凯泽. 2020. 福利国家的变迁: 比较视野[M]. 文姚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Seeleib-Kaiser M. 2008.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马克·费舍. 2024.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M]. 王立秋,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Fisher M. 2009.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 Washington, D. C. : O Books.
- 马克思. 2004a. 资本论: 第一卷[M]. 2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b. 资本论: 第二卷[M]. 2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迈克尔·布洛维. 2011. 从波兰尼到盲目乐观: 全球劳工研究中的虚假乐观主义[J]. 刘建洲, 译. 开放时代, (10): 86-99.
- (original language) Burawoy M. 2010. 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 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J]. *Global Labour Journal*, 1(2): 301-313.
- 孟捷. 2016.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Meng J. 2016.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t economics*[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n Chinese)
- 蒙克. 2024. 福利国家将死, 社会政策永存[J]. 文化纵横, (6): 56-64, 158.
- Meng K. 2024. *Welfare states fade, social policies endure*[J]. *Beijing Cultural*

- Review, (6): 56-64, 158. (in Chinese)
- 穆光宗. 2019. 中国的人口危机与应对[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6(5): 69-76.
- Mu G Z. 2019. China's population crisis and its response[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6(5): 69-76. (in Chinese)
- 南希·弗雷泽. 2023. 食人资本主义[M]. 蓝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Fraser N. 2022.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M]. New York: Verso.
- 萨拉·哈珀. 2022. 人口学[M]. 许黎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Harper S. 2018. Demogra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萨拉·萨卡. 2014. 两种不同的人口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视角[J]. 申森,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 11-18.
- Sarkar S. 2014. Two different population crises: an eco-socialist perspective [J]. Shen S, trans.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 11-18. (trans. into Chinese)
- 宋少鹏. 2024. 从“生活”出发: 再思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实践[J]. 妇女研究论丛, (4): 6-15.
- Song S P. 2024. Starting from “life”: rethinking the practice of “re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J].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4): 6-15. (in Chinese)
- 王峰明. 2021. 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历史发展——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互文性解读[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0): 69-82, 164.
- Wang F M. 2021. Material production, 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an inter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Engels's theory of “two types of production”[J]. Studies on Marxism, (10): 69-82, 164. (in Chinese)
-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2023. 超越身体边界[M]. 汪君逸, 译. 上海: 上海光启书局有限公司.
- (original language) Federici S. 2020. Beyond the periphery of the skin[M]. Oakland: PM Press.
- 亚历山德拉·梅扎德里. 2023. 激进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非正规劳动、多数世界以及对包容性理论和政治的需求[J]. 闫金敏, 代学鸿, 译. 国外理论动态, (4): 51-58.

- (original language) Mezzadri A. 2019. On the Valu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formal labour, the majority world and the need for inclusive theories and politics[J]. *Radical Philosophy*, 2(4): 33-41.
- 伊娃·易洛思. 2023. 冷亲密[M]. 汪丽,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Illouz E.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张宇. 2024.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若干基本问题再认识——基于劳动主体性的思考[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2): 1-23, 148.
- Zhang Y. 2024. Re-understanding some basic issues of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thinking based on the subjectivity of labor[J]. *Studies on Marxism*, (12): 1-23, 148. (in Chinese)
- 赵丁琪. 2024. 倦怠社会、技术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访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9(6): 68-79.
- Zhao D Q. 2024. Burnout society, techno-feudalism and the crisis of western capitalism—interview with the renowned philosopher Slavoj Žižek[J]. *World Socialism Studies*, 9(6): 68-79. (in Chinese)
- 赵小宇. 2024. 生命视差: 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三重维度[J]. *国外理论动态*, (3): 145-151.
- Zhao X Y. 2024. The biopolitical disparity: three dimensions of Foucault's biopolitics[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3): 145-151. (in Chinese)
- 周彦华. 2024. “管理你的情感!”——劳伦·伯兰特的公共情感研究[J]. *中国图书评论*, (5): 67-75.
- Zhou Y H. 2024. “Manage your emotions!”: Lauren Berlant's study of public affect[J]. *China Book Review*, (5): 67-75. (in Chinese)
- Arruzza C, Bhattacharya T, Fraser N. 2018. Notes for a feminist manifesto[J]. *New Left Review*, 114: 113-134.
- Cox J. 2020[2026-06-15]. How Marx and Engels fought for women's liberation[J].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66). <https://isj.org.uk/jcox-marx-engels-women-lib/>.
- Dike M R. 2021. “The machine does it!”: using convenience technologies to analyze care, reproductive labor, gender, and class in urban Morocco[J]. *Economic Anthropology*, 8(2): 311-325.
- Fraser N. 2013. A triple movement? 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J]. *New Left Review*, 81: 119-132.
- Fraser N. 2016.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J]. *New Left Review*, 100:

- 99-117.
- GBD 2021 Fertility and Forecasting Collaborators. 2024. Global fertility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50—2021, with forecasts to 2100: a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J]. *The Lancet*, 403(10440): 2057-2099. DOI: 10.1016/S0140-6736(24)00550-6.
- Hardt M, Negri A. 2017. *Assembl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leinman A. 2019. *The soul of care: 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husband and a doctor* [M]. New York: Penguin.
- Littler J, McRobbie A. 2022. Beyond anti-welfarism and feminist social media mudslinging: Jo Littler interviews Angela McRobbie[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5(1): 327-334.
- McRobbie A. 2020.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 essays on gender, media and the end of welfa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arker K, Wang W. 2013. *Modern parenthood: roles of moms and dads converge as they balance work and family*[R]. Washington, D. C. : Pew Research Center.
- Polanyi K. 2018. *On freedom*[M]//Cangiani M, Thomasberger C. *Economy and society: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ilver B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zelényi I, Mihályi P. 2021. Karl Polanyi: a theorist of mixed economies[J]. *Theory and Society*, 50(3): 443-461.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LI Yile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series of crisis phenomena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cluding low fertility rates, rising health risks, declining willingness of care, and increasing social movements centered on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gives an explanation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Drawing on Marx, Polanyi, and Marxist feminism, it traces how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has been gradually subsumed under capitalist production. The instrumental demand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for

labor quantity and quality persistently clash with the affective, non-efficiency-driven logic of reproductive activities, eroding society's care capacities and fueling radical struggles in the reproductive sphere. State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 inherently incapable of reconciling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end toward further dysfunction amid sluggish growth and rising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light of technological shifts and reproductive dilemmas, overcoming this crisis require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reorient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serve human needs, and rebuilding collective support systems for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Keywords: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crisis; Marx; Polanyi; Marxist feminism; care